



粟裕在浙西南的光辉岁月

挺进浙江

1934年6月,在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前夕,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,深入闽浙赣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,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,推动抗日运动。

7月6日晚,先遣队约6000人从江西瑞金出发,开始浴血征战。其间,一度转战浙西南的庆元、龙泉,进占庆元县城,取得竹口大捷。10月中旬,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.6万余人,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,开始长征。至此,先遣队奉命保存实力,进入闽浙赣苏区,结束4个月的“小长征”。先遣队以弱小的兵力,浴血敌后,征战1600余公里,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,高举抗日大旗,并为各游击区留下军事骨干,作为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35年1月,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的红十军团(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),在江西怀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,指战员大部牺牲,战略策应长征的行动遭受挫折,粟裕指挥先头部队浴血突围,转移至原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广财山,找到闽浙赣省委,保留了革命力量。

省委随即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电令,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,组建红军挺进师,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。浙江是国民党统治腹地,斗争环境特别恶劣,1927年6月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屡遭破坏,不到两年就更替了十位书记(代理书记),致使1929年4月中共中央被迫撤销浙江省委建制;全省相继爆发的60多次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。以粟裕为师长、刘英为政委,仅500余人的挺进师,不惧兵力弱小、弹药匮乏、毫无接应,抱着继承先烈遗志、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,誓死出征。途中遭敌袭击,电台被毁,与上级失去联系,陷入孤军奋战后,依然义无反顾,决心以自己的行动,打开进入浙江的局面。

为实现战略转变,部队在闽北开展整训,建立政治委员会加强领导,以适应游击战。接着,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,吸引、调动敌人,造成敌人误以为挺进师将立足闽浙边,然后于4月下旬在庆元斋郎精心部署,迎击被吸引而至的近4000敌人,取得大捷,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。

转战浙西南

斋郎大捷后,粟裕和刘英率部乘胜挺进浙西南腹地,在松阳县境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的欢迎后,分兵以发动群众,集中以打击敌人,开辟根据地。1935年6月上旬,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,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,部署创建根据地。7月,粟裕率挺进师师部机关进驻遂昌县王村口,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。

为吸引和牵制敌人、战略策应长征,挺进师广泛开

1934年8月至1938年3月,粟裕率部挺进浙西南,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付出巨大牺牲,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地区孤军奋战,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、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周德春 据《学习时报》



展游击战。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,然后开仓济贫,打土豪分发浮财,发动群众投身革命。开展八一军事大示威,主动出击,袭击大小城镇19个,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沿线。在松阳、遂昌、龙泉、江山、浦城五县间建立革命根据地,轰轰烈烈地开展查田、插标、分青苗的土地革命。

挺进师的斗争,迅速吸引了国民党军。1935年8月,国民党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,大举“清剿”浙西南。粟裕等创造性地实行“敌进我进”,留下第二、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,率主力突破敌包围圈,挺进敌后,转战闽浙边,吸引、调动敌人,后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,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,联合开展斗争,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。

1936年2月以后,刘英率突击队在浙南开展工作;粟裕率牵制队广泛游击,数度转战浙西南,在龙(泉)浦(城)江(山)遂(昌)边建立游击根据地。1936年6月,粟裕率部收复王村口时,仔细侦察分析敌情,深入群众调查研究,然后根据敌人布防严密、当地老农判断近日有暴雨天气的信息,率部于深夜出发,跋山涉水绕过王村口向衢县方向开进。途经独口村时只缴敌哨兵的枪

械,任凭敌哨兵逃回王村口,待敌人确信红军已开赴衢县时,又把部队秘密拉回到龙泉住溪,然后利用暴雨大雾天气和敌人放松布防之机,突袭王村口,无一伤亡地收复王村口。这次行动表现出粟裕坚持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。

1937年初,国民党再次大举“清剿”挺进师,粟裕等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,将部队“化整为零”,分兵游击。4月,粟裕率部活动至遂(昌)宣(平)汤(溪)边区,与谢文清部会合,建立游击根据地,依托根据地出色开展反“清剿”,使敌哀叹“未奏肤功”。

实现抗日夙愿

自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开始,粟裕始终把宣传、推动抗日运动作为重要任务,在挺进师开展活动的各地,到处都有“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力量”“废除卖国条约”等宣传抗日的标语。

粟裕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,不仅一再呼吁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,而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,自觉地根据形势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,用实际行动争取团结抗日。一是将挺进师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,不再打土豪筹集经费,而是根据地土豪绅的负担能力,向其征收抗日捐;二是推行“白皮红心”的两面政权,对国民党乡镇长和保甲长,由镇压改为争取,使他们为红军服务;三是区别对待士绅和中等商人,进步的欢迎,中立的允许来去自由,继续营业不受侵犯,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,发展山区经济,改善群众生活;四是改“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”为“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,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”;五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城镇知识分子的工作,许多知识分子手中的书报,成了粟裕了解和分析形势的重要信息来源。

1937年9月,率部活动在浙西南的粟裕,根据形势和“共产党投降了”“红军被收编了”的传闻,敏锐地觉察到国共两党可能已开始合作抗日。得到证实后,他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倡议合作抗日。9月18日,遂昌县当局复函,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“接洽”。高度警惕的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,要求对方派代表到根据地谈判。

10月14日,粟裕指派谢文清、刘清扬与遂昌县当局代表在根据地中心门阵村举行和谈,达成合作抗日协议。10月19日,粟裕率部开赴浙南集结待命。离开门阵前,许多根据地农民积极分子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抗日,但粟裕坚持不带走有家庭负担的同志,不增加群众负担,只带走了没有家庭负担的7人。

1938年3月18日,粟裕率挺进师主力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离开浙南,奔赴皖南前线,开始驰骋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。

李叔同育人如琢玉



1911年,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,次年,便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和图画。在这里,他等来了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两个学生:丰子恺和刘质平。教图画课时,他把在东京的学习经验搬到自己的课堂上,策划了一场人体写生课。这全新的艺术实践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堂人体写生课。而他的音乐教室,四周装着新式玻璃窗,居中放着两架钢琴,周边贴墙放着50多架风琴。这样的阵容,国内唯一。

李叔同每周教一次钢琴课,授课时他先弹一遍做示范,然后学生去练习。一周后学生再弹给他听,他称

之为“还琴”。“还”不好的,也就是弹得不合格的,下次继续“还”。第一次上他的钢琴课,琴没有“还”好的,就是那一届担任级长的丰子恺。紧张过度的他不是指法错,就是按键错,弹得乱七八糟。与他的图画相比,实在逊色多了。李叔同不仅是识器的伯乐,更是一位雕琢璞玉的大师。作为级长,丰子恺要经常向先生报告班上的重要事务。在一个仲夏夜进行的简短汇报后,李叔同轻松两句话,便点透了丰子恺一生的道路:“你的图画进步很快,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,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的学生,你以后可以……”聪明的丰子恺从此决定一生与笔墨为伴。

而对音乐资质最高的刘质平,李叔同却用了很特殊的教化方式。在一个积雪如毯的隆冬,刘质平刚刚

作了一首曲子,便踏雪去向先生请教。李叔同拿着曲谱细细阅过,抬头道:“今晚八点三十五分,去赴音乐教室,有话讲。”到了晚上,刘质平冒着狂风暴雪来到音乐教室门口,发现早有人的足迹通向室内,而教室的门却是关闭的。他不敢轻率推门,礼貌地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待。

大概过了十几分钟,教室里的灯一下子亮了起来,李叔同拿着金表走出来,认真地说:“时间无误,你饱尝了风雪之味,可以回去了。”

李叔同不仅仅是考验学生是否守时,更是考验刘质平面对暴风雪的不畏难情绪,拥有这些素质,美玉方可雕成器。从此以后,师生二人情如父子。

沈治鹏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